

雲南教育大事記

云南教育大事记

(公元前121年—公元1988年)

云南省教育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

云南大学出版社

1989·昆明

责任编辑：张世鸾
封面设计：潘启发 叶祖荫
封面题字：陶学尧
责任校对：刘万全 刘坚杰

云南教育大事记

云南省教育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

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军区后勤部驻昆办事处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16 印张：33 字数：750,000

1989年10月第1版 1989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ISBN 7—81025—023—X/G·1

定价：11.95元

编 辑 说 明

为了对两千多年来云南教育的发生、发展进行系统研究，总结经验教训，为各级领导机关、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及有关研究人员提供基本史料，起到“资治、教化、存史”的作用，我们编辑了这本《云南教育大事记》。

本书从公元前121年司马相如入西南夷，大理地区的张叔、盛览跟随他学习起，到1988年12月31日止。依云南教育的历史沿革，分三段编写：1. 古代部分（公元前121年—1911年）；2. 民国时期（1912年—1949年）；3.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49年—1988年）。

本书以全省性教育史事为主，以全省各级各类学校的教育为中心内容，记述对全省教育事业发展作用大、影响久的大事，或不记即成缺门的要事，带有起点性的新事，教育制度、教育思潮等。记述采用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相结合，以编年体为主。依年、月、日编排条目。日期不明的列于该月之下，称“本月”；月份不明的列于该年之下，称“本年”。一事一条，大事稍详，要事简略；现代稍详，古代简略。有少部分内容虽不属大事，但为保存资料，便于读者了解云南教育发展的脉络和历程，仍将它们列入“本年”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资料尤为翔实，故编有索引，以便于查找。

本书依据的资料是机关文件，省教育厅、省档案馆、省图书馆档案，报刊和有关单位、人员提供的材料。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省地方志办公室、省教育厅各处室、教育界老同志和云南大学出版社张世鸾副总编辑的热情指导和帮助，云南大学历史系林超民副教授对古代部分史料进行了订正，谨致以衷心的感谢。囿于编者的水平，遗漏、错误一定不少，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云南省教育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1989年6月12日

序

云南是伟大社会主义祖国西南边疆的一个多民族省份。虽然由于历史的原因，经济、社会发展都比较落后，但她仍然有自己光辉灿烂的文化，有自己教育发展的历史。

早在一百七十万年前，在云南这块土地上就已生活着“元谋人”。据考证，彝族文字早在汉代已经出现，而傣文则早在距今2000年至2600年前就已出现。文字的功能，除记事外，便是教育。所以，就广义的教育而言，云南无疑是中国教育史上最早出现教育活动的地区之一；但就狭义的学校教育而言，由于山川阻隔，交通不便，云南却大大晚于中原地区。我国夏代时已有学校，而云南直到汉代元和二年（公元85年），益州太守王阜在滇池地区“兴起学校，渐迁其俗”，这时才出现学校，晚于中原地区约二千余年。1902年，普洱府中学堂创办，云南才有了第一所近现代新型学校。1922年，云南省省长唐继尧创办私立东陆大学，这是云南历史上第一所正规的高等学校。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北京、天津、上海和其他一些地区的学校内迁，昆明地区一时人才荟萃，如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就达八年之久，推动了云南省教育事业的发展。但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诸种因素，云南教育仍然比较落后。1949年底，全省仅有高等院校4所，在校学生1653人；中等技术学校6所，在校学生1623人；中等师范学校11所，在校学生5170人；普通中学134所，在校学生2.23万人；小学5320所，在校学生16.8万人。总的来看，教育发展水平很低。全省人口中85%是文盲，学龄儿童入学率仅占20%；各级各类在校学生仅占全省人口1595万的1.3%。一些民族没有自己的大学生、中学生，甚至没有小学生。一些边疆、山区、民族地区还存在刻木记事、结绳记事及以豆计数等现象。

解放后，云南省的教育事业获得了蓬勃发展。新中国成立四十年来，云南教育事业虽然走了一些弯路，经历了若干曲折，但总的来看，发展迅猛，成就巨大。截止到今年9月，全省有高等院校27所（其中，本科院校12所），在校学生4.4万人；经国家教委审

定备案的成人高校32所；普通中学1885所（其中，完全中学518所），在校学生119.3万人；中等专业学校127所，在校学生6.7万人；农业职业中学208所，在校学生6万人；小学5.5万所，在校学生480万人。各级各类学校在校学生占全省人口3600万的17.1%。在边疆民族地区，举办了503所寄宿制民族中、小学和3000所半寄宿制高小。全省从城市到农村，从内地到边疆，各级各类学校的办学条件都有明显改善。特别是师范教育体系和民族教育体系的初步建立，对进一步改变云南的教育面貌将起到决定性的影响。四十年来，全省共培养出大专毕业生12.7万人，中专毕业生30.4万人。另外还有102万名高中毕业生，369万名初中毕业生，1157万名小学毕业生直接参加了工农业生产。他们组成了不同年龄、不同文化层次的劳动力结构，为云南省的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贡献。

教育的根本意义在于提高人的素质，包括文化素质、思想素质、身体素质和劳动技术素质。云南经济的振兴，改革、开放要卓有成效，并求得与先进省市同步，教育的任务是相当重的。制定云南教育发展规划，必须从云南的实际出发，综合考虑各种因素：解放初期，全省24种少数民族处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全省面积的94%是山区，地区经济发展很不平衡，文化水平有很大差异，教育布局、结构不合理，教育的普及程度低，质量不高；在教育思想、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上，不少课程内容陈旧，教学方法死板，实践环节不被重视，专业设置过于狭窄，不同程度地脱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积极开展对云南教育的历史和现状的研究工作，对于提供历史借鉴和科学依据，让领导机关进行决策时少一些随意性、主观性，多一些科学性、民主性，对于指导当前的教育改革，正确地规划未来，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过去，我们在这方面是做得不夠的。《云南教育大事记》的出版，标志着这项工作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从《云南教育大事记》所记述的历史事件中，能够看到一些应该接受的经验教训，可以找到一点今后教育发展改革的端倪。司马迁撰述《史记》的旨意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如果《云南教育大事记》的出版能在这方面起到一点积极作用，那么，编写这本书的目的就算是达到了。

张继康

1989年9月

目 录

序..... (1)	1923年..... (39)
古代教育 (公元前121年 — 公元1911年)	1924年..... (39)
汉 (前121年—公元167年) (1)	1925年..... (40)
西 晋 (公元310年) (2)	1926年..... (40)
唐 (713—835年) (2)	1927年..... (41)
后 晋 (937年) (3)	1928年..... (42)
宋 (1004—1202年) (3)	1929年..... (43)
元 (1276—1367年) (4)	1930年..... (45)
明 (1374—1624年) (5)	1931年..... (49)
清 (1645—1911年) (13)	1932年..... (50)
民国时期 (1912—1949年)	1933年..... (51)
1912年..... (32)	1934年..... (52)
1913年..... (33)	1935年..... (54)
1914年..... (34)	1936年..... (58)
1915年..... (34)	1937年..... (60)
1916年..... (35)	1938年..... (63)
1917年..... (35)	1939年..... (67)
1918年..... (35)	1940年..... (72)
1919年..... (36)	1941年..... (74)
1920年..... (37)	1942年..... (77)
1921年..... (38)	1943年..... (79)
1922年..... (38)	1944年..... (82)

1945年·····	(84)	1967年·····	(333)
1946年·····	(88)	1968年·····	(336)
1947年·····	(92)	1969年·····	(341)
1948年·····	(95)	1970年·····	(341)
1949年·····	(100)	1971年·····	(344)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1949—1988年)		1972年·····	(347)
1949年·····	(105)	1973年·····	(350)
1950年·····	(105)	1974年·····	(352)
1951年·····	(117)	1975年·····	(358)
1952年·····	(126)	1976年·····	(366)
1953年·····	(138)	1977年·····	(369)
1954年·····	(152)	1978年·····	(372)
1955年·····	(167)	1979年·····	(379)
1956年·····	(187)	1980年·····	(384)
1957年·····	(204)	1981年·····	(395)
1958年·····	(221)	1982年·····	(403)
1959年·····	(232)	1983年·····	(410)
1960年·····	(245)	1984年·····	(418)
1961年·····	(260)	1985年·····	(432)
1962年·····	(273)	1986年·····	(445)
1963年·····	(286)	1987年·····	(466)
1964年·····	(304)	1988年·····	(490)
1965年·····	(315)	索 引 ·····	(510)
1966年·····	(327)		

一、古代部分

(公元前121年—公元1911年)

西 汉

汉武帝 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

汉元狩二年，汉武帝派中郎将司马相如持节开越嶲，按道侯韩说开益州，授经教学（事载谢肇淛《滇略》）。

云南人盛览（牂榆人）、张叔（牂榆人）“闻司马相如至若水造梁，遂负笈往。从之受经，归教乡人”（事见《太平御览》）。

（据《西京杂志》，盛览为“牂牁名士”，牂牁指今云南、贵州两省接壤的一大片地区，故云南、贵州史志均载其人其事。备考。）

盛览著有《赋心》四卷。盛览、张叔均为云南史上有记载的教育家。

汉武帝 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

郎中司马迁奉汉武帝之命出使邛、（今四川西昌）、笮（今四川雅安）、昆明（今洱海地区），在牂榆（今大理）设立讲台，传授学问。

东 汉

汉章帝元和中(公元85年)

元和中，益州太守王阜（《后汉书》作王追）在滇池地区始兴学校，云南至此正式兴办学校（事见《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

据《华阳国志·南中志》载，王阜（《后汉书》作王追）任益州太守的时候，曾亲自以今文经学派的《韩诗》教授生徒并察举孝廉。据在昭通出土的《孟孝琚碑》考证，东汉一代，从汉武帝徙民实边中的地方大姓子弟已在学习经学，孟孝琚就是“受韩诗，兼通孝经”的人才。从汉武“开滇”，到东汉章帝时已经200年左右，经学已在益州一带传播开来。

汉明、章帝时(公元58年—86年)

牂牁人（一说为平夷人，一说为毋敛人）尹珍，从汝南许慎（即《说文解字》作者）受经书、图纬，学成，还乡里教授。尹珍后官至尚书丞、尚书郎、荆州刺史（事见《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华阳国志·南中志》）。

注：平夷，为夜郎郡四县之一；毋敛，今云南富源。

汉 代

据史料载，彝文开始在彝族地区出现，部分彝族文人用它记录一些有关历史、文学、天文和医药的资料。彝文是一种超方言的音节文字，一个字形代表一个意义（有关彝文的创制年代，有不同说法，有汉代起源说，有隋唐时代创制说，也有元代成文说）。

汉 代

据傣族学者考证，傣文在距今2,000—2,600年前已经出现，少数傣族文人开始用某种教育方式传续着这种“老傣文”。

西 晋

晋怀帝永嘉四年（公元310年）

南夷校尉、宁州（含今云南大部分、四川、贵州一部分）刺史王逊推举建宁（今滇东北、滇中一带）人董敏为秀才。

晋始建选举秀才之制，从西晋武帝太康年间至北周武帝宣政年间（公元280—578年），云南秀才以万计，董敏在当时被称为“滇中第一秀才”，此后还有庞遗、爨宝子、爨龙颜等名秀才。宁州地区文化教育已有相当发展。

唐

唐玄宗开元元年（公元713年）

南诏（今大理地区）晟罗皮立孔子庙于国中（据《南诏野史》，晟罗皮立孔子庙为开元十四年。备考）。这是云南建造的第一座孔子庙。

开元二年（公元714年）

南诏国王晟罗皮派遣其宰相张建成到长安朝见唐玄宗。玄宗赐给南诏丰厚的礼物，如浮图象、佛教书籍。张建成回到南诏后，在当地传授佛经。云南从此开始有佛教书籍（见李京《云南志略》）。

又，（张道宗《记古滇说》载）张建成喜州人，为晟罗皮宰相。入觐，过成都大慈寺。适寺初铸神钟已成，寺僧曰：“击钟一声，施金一两”。时建成连叩八十声，僧惊问曰：“汝何人？连叩如此！”曰：“吾南使张建成也。”僧乃易其名曰“化成”，成曰：“佛法南矣！”遂学佛书，归授滇人。至京，时玄宗在位，厚礼待之，赐以浮图而归（两说俱录此，以备考）。

肃宗圣德二年（公元757年）

南诏王阁罗凤攻陷嵩州（今西昌），虏西泸县（今西昌县南）县令郑回至南诏，郑回“文雅有祠藻”，很有学问。郑回被俘后，阁罗凤让他充当南诏王子的教师，成为南诏诸王子学习汉文化的严师，很受尊重。后异牟寻为南诏国王时，任命郑回为清平官（宰相）（见《新纂云南通志·大事记》）。

德宗贞元十五年（公元799年）

南诏国王异牟寻将大臣子弟送剑南节度使韦皋处为人质。韦皋为了维持唐朝与南诏

的和好关系，主动表示要废除属国送子弟至京城充当人质的制度，但南诏却一定要送，以表示归顺唐朝的诚意。于是韦皋在成都办了一所学校，专供南诏子弟学习，“教以书、数”，学成后回云南，又换一批。连续办了五十年，到学校学习者先后达数千人（事见《新纂云南通志·大事记》）。

又，据《通鉴》载：韦皋在成都设学校教育南诏子弟。……如是十五年，……子弟学于成都者，殆以千计，军府颇厌于廩给。杜棕为西川节度使，奏请减其额，诏从之。南诏丰祐怒，其贺冬使者留表付嵩州而还，又索习学子弟，移牒不逊（录此与前一说参见）。

穆宗长庆三年（公元823年）

南诏丰祐（公元823年）起，设学校，置教官，以益州人张永让，国人（唐朝中原人）赵永本为之（事见《道光云南志钞》）。又，此事《南诏野史》记为“长庆五年”，而穆宗长庆共四年，疑为“三年”之误，参见南诏丰祐年可证，此事应为公元823年，亦即长庆三年）。

文宗太和中（公元827—835年）

南诏（一说鄯阐）人张忠诚，游成都，学习书法，得到王羲之、王献之字帖，如获珍宝，多次摹写。回乡后，不少人向他学习二王书法。

后 晋

后晋高祖天福二年（公元937年）

大理国国王段思平开科取士，促进了当地教育的发展，学风大盛，连僧人、道士也学习诵读儒家书籍。据郭松年《大理行记》载：大理国的宫室楼台道观及言语书教，虽然未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但其规模服饰，动作行为，都大体和汉族一致。僧人、道士往往习读儒家书籍，所诵读的经律，与中原地区一样。

这是云南历史上最早开科取士的记载（事见郭松年《大理行记》）。

北 宋

宋真宗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

大理王国段素英开科取士，“定制以僧道读儒书者应举”（《南诏野史》记：段氏有国，亦开科取士，杂流并进，“今始以僧道通儒书者为制科”）。

徽宗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

大理国王段正淳派高泰连出使宋朝京城，求得经书69种，各类药书62本。

南 宋

宋孝宗乾道九年（公元1173年）

大理人李观音得、董六斤黑、张般若师（均以三字为名）等一行23人往邕州（今南

宁)横山商议买马匹,并提出求购一批儒、佛百家著作,主要是:《文选五臣注》、《五经广注》、《春秋后语》、《三史》、《都大本草广注》、《五藏论》、《大般若十六会序》、《初学记》、《切韵》(张孟押著)、《玉篇》、《集圣历》等。

宁宗嘉泰二年(公元1202年)

大理国派人入宋,取得《大藏经》共1465部,存放在五华楼。

理宗淳祐九年(公元1249年)

宋理宗派遣使臣,带新经书、银百两到大理国,宣读皇帝为悼念大理国将领高禾抗元战死的士卒的祭文(见阮元声《南诏野史》)。

(据倪蜕《滇云历年传》:淳祐六年,大理国王段兴祥派廉祐入朝,诏使与廉祐同来,致经籍。两说人名有异,年代稍左,存此备考)。

元

世祖至元六年(公元1269年)

元朝政府中书省立学制并颁布实行,命令:诸路、府官子弟均须入学,规定上路二人,下路二人,府一人,州一人。余民间子弟,上路三十人,下路二十五人。愿充生徒者免一身杂役。又以译写《通鉴节要》颁行各路,让学习者阅读(见倪蜕《滇云历年传》)。

世祖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

云南行省平章政事赛典赤在昆明城内建孔子庙、明伦堂,讲授经史,并拨出田地五顷,供孔子庙的祭祀和教养之用。从此,昆明地区正式有了学校,文风逐渐兴盛起来。赛典赤以孔庙建立府学,首先从省城开始,开办学校,然后再向各州、县推广。昆明的庙学每期150名学生,各族子弟都可入学。赛典赤兴学后,打破了昆明地区原有的南诏、大理的文化体系,昆明地区的文化与学术思潮,逐渐与中原地区趋于一致。赛典赤死后,昆明的学田、地产被大德寺占据。成宗大德九年(1305),赛典赤的第三个儿子忽辛由陕西行御史台御史中丞改任云南行省右丞后,收回被大德寺占据的田地,仍归孔庙所有。并且命令各邑也普遍建立孔庙,选拔文学之士充任教官,使得各地“文风大兴”。

世祖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

元朝政府命令云南各路都要建立学校,祭祀先圣孔子(见《元史·选举志》)。

世祖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年)

元朝政府命令诸路各县学内设立小学,聘请老成有学问之士教授,或者自愿招聘教师,还可以跟随自己的父亲兄长学习。其他儒士讲学的地方与有钱人家自己出钱贍供学校的,同时成立书院。书院设山长一员(书院与一般府、州、县学不同,带有精修深造的意思,主讲者多数是名儒,一般非官办)。

世祖至元二十九年(公元1292年)

云南诸路开始建立学校,由四川学者担任教师。

成宗大德九年(公元1305年)

云南行省下令诸郡、邑普遍建立学校。

仁宗皇庆二年（公元1313年）

元朝政府诏令全国在冬十月开科举。次年三月，在京会试，合格者共300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各取75人。其中蒙古人内云南1名、色目人内云南2名、汉人内云南2名（限额云南取5名）。

延祐元年（公元1314年）

元朝政府下令设置云南行省儒学提举司。这是专门管理儒学的行政部门。

英宗至治元年（公元1321年）

元代举行全国第二次会试，昆明人王楫中了进士。这是云南第一个中进士的人。此后又有李敬仁、李郁、段天祥、李天佑4人先后中了进士。

文宗至顺二年（公元1331年）

元朝廷任命支渭兴（字文举，郃阳人，至顺元年进士）为云南行省考试官。这是记入云南史籍最早的考试官。

惠宗至正元年（公元1335年）

元顺帝发布诏令，罢除科举制。

惠宗至正五年（公元1345年）

蜀国公脱欢普花在云南捐赠俸禄，修建学校，每月初一、十五讲授经学。每次讲课到黄昏时才停止，听讲的人充满庭院。

惠宗至正二十三年（公元1363年）

昆明成立御书阁。这是云南历史上的第一个藏书馆。

惠宗至正二十七年（公元1367年）

云南梁帖木儿不花死后，其宗室把匝剌瓦尔密自立为梁王，1371年改元为宣光。同时恢复科举制，开科取士。仍任命支渭兴为考试官，主持考试事务。

（据阮元声《南诏野史》：云南梁王开科取士，以临安廉访使支渭兴主试事在至正十九年，即公元1369年。录此备考。）

元代全省共有进士6人，除苏隆（年分无考）1人为赵州人外，其余王楫、李近仁、李郁、段天祥、李天佑5人均属昆明人。

明 代

太祖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

阿迷州设儒学。这是明代新建的第一所州儒学。洪武十五年夏四月，又置云南（今昆明）、大理府及蒙化等州儒学。洪武十五年九月，黜国子助教单仲佑为云南大理儒学教授。洪武十七年秋七月，置云南、楚雄二府儒学。

太祖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

洪武15年朝廷明令各地自明年始，岁贡生员各1人。

洪武18年又命“所属学校生员有成材者，不拘常例从便选贡”（见《明会典》）。

（据阮元声《南诏野史》，洪武十七年，云南始开贡。录此备考。）

太祖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

云南一些少数民族土官送子弟赴京入国子监读书。这是云南少数民族土官送子弟入

京读书之始（《续文献通考》：洪武二十一年，云南囉囉土官遣二子入监读书）。此后习以为常，如洪武二十二年，西南诸夷乌蒙、芒部各土官，皆遣子入监；洪武二十三年，西南夷土官皆遣子入学；洪武二十五年，云南等处土官，时遣子弟民生入监读书者甚众，赐给亦每与外夷同，国子监前别造房屋百间居之。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云南土官张文礼等入监者二十八人。是后滇、蜀土官民生入监者多至六七十人（事见《续文献通考》、《大政记》等）。

太祖洪武二十二年（公元1389年）

朝廷命令云南选贡赴应天府（今南京）参加乡试（《野史》载）。是年，贡生至京入监读书者，俱给钞锭、衣被、鞋袜、房室。

因当年云南尚未开科，故直到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云南选贡始赴应天府乡试。当年，中试者有昆明人李忠、杨嵩，李忠又进士及第，三年后（公元1396年）又有昆明人杨庆、段澍俱成进士；六年后（公元1402年），又有宁州人张文礼、王遵中试，张文礼成进士（事见倪蜕《滇云历年传》）。

洪武二十三年秋七月，云南乌撒军民府土官知府何能遣其弟忽山及伊保生二人请入国子监读书，各赐钞锭。

洪武二十三年九月，云南乌蒙、芒部二军民府土官遣其子以作捕驹等请入国子监读书，赐以衣钞。……赐国子监云南土官子弟以作等凡六十九人袂衣、犷被。

太祖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

西平侯沐英刻周敦颐《太极图说》于石碑，又于碑阴（后面）刻朱熹《白鹿洞规》，置于学馆（一说“立于文庙四斋之中”）。

洪武二十五年十二月，置云南沅江府儒学。时沅江府言：“土官子弟，编氓多愿读书，宜设学校以教之。”诏从之。

洪武二十八年六月，户部知印张永清言：“云南、四川诸处边夷之地，民皆伊徭，朝廷与以世袭土官，于三纲五常之通懵焉莫知，宜设学校以教其子弟”。上然之，谕礼部曰：“边夷土官皆世袭其职，鲜知礼仪，治之则激，纵之则玩。不预教之，何由能化？其云南、四川边夷土官皆设儒学，选子孙弟侄之俊秀者以教之，使之知君臣父子之义而无悖礼争斗之事，亦安边之道也”。

太祖洪武年间

山西右参政王景常（浙江松阳人）、山西布政韩宜可（浙江山阴人）“以事谪戍临安（今建水）”，二人在临安讲学十六年，二人俱“心行纯正，乐居绝徼，忘中土，相与讲道于庙东北偏，……临弟子始有学焉”（见欧阳重《临安景贤书院记》）。对临安地区的文化教育，影响极大。

永乐元年八月，设云南楚雄府楚雄县儒学。先是本府言：“所属人民类皆蛮夷，不知礼义，惟楚人一种，赋性温良，有读书识字者。府、州已设学教养，其县未设。今楚雄县所辖六里，而楚过半，近委官劝集民间俊秀子弟入学读书，而无师范。请立学置官训诲”。从之。

永乐二年秋七月，吏部言：“有进士自陈是云南人，不闲吏事，愿为教官。”上喜曰：“云南人能举进士，可嘉！就授云南学官，以劝其乡人”。

永乐四年六月，设云南镇南州儒学。置学正、训导各一员。

永乐五年六月，巡按云南监察御史顾斌言：“云南所属郡县皆有儒学，而春秋释奠先师，唯云南府学行之，请令各府州县学皆释奠礼。”从之。

永乐六年四月，巡按云南监察御史陈敬言：“云南自洪武中已设学校教养士徒，今郡县诸生多有资质秀美、通习经义者，宜如各布政司三年一开科取士”。又言：“师儒之职，为后学矜式，云南郡县学教官多用土人，学问肤浅，容止粗鄙，不称师范，宜别选用明经行修之士，庶几教养有法”。俱从之。

成祖永乐九年（公元1411年）

朝廷诏令云南布政司始行乡试。当年有洪诚等二十八人中举，其中洪诚、杨春二人举进士。

同年九月，云南通省贡生考试，取赵诚等二十一人。称为“考贡”。

永乐十年三月，云南布政司左参议吕名善言：“武定、寻甸、广西三府居民繁庶，请设学校”。从之。

永乐十六年二月，云南丽江军民府检校庞文都言：“本府宝山、巨津、通安、茵州四州归化日久，请建学校”。从之。

成祖永乐年间

云南设按察使司副使，提督各府、州、县的53处儒学，即掌管全省教育。这是明代设置最早的地方教育行政长官。据《明史·职官制》载，明初各省即设儒学提举司，但云南史料无载。英宗正统元年（公元1436年），云南设按察司副使或金事一员，“奉玺书提督学校”。这是明代云南设置最早的督学官员（永乐年间设的非专职）。永乐十二年（公元1414年），诏令云南举人明年会试于北京。

仁宗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

朝廷规定云南会试举人考卷入中卷（全国会试考卷分为南、北、中3卷），取士名额为10名。

宣宗宣德四年（公元1429年）

朝廷诏令贵州生儒到云南参加乡试。这年秋试，贵州李铨等11人考中举人。贵州府云南乡试期间，其教育由云南提督官管理、监督，至宪宗成化六年（公元1470年），朝廷才诏令贵州设分巡官兼理学务。贵州学者因山高路远、赴试困难，不断要求在贵州独立开科，但朝廷未允。仅于孝宗弘治六年（公元1493年）同意将《云南乡试进呈录》改称《云贵乡试录》。此后直到世宗嘉靖十四年（公元1535年），贵州省才单独开科。解额定为25名（云南40名）。

宣德四年六月，诏增云南科举额，由十名增至十五名。

明《英宗实录》载：正统元年（公元1436年）二月，云南金齿军民指挥司奏：“本处亦有俊秀子弟，乞开设学校以教育之。”从之。

正统元年五月，户部奏：“查得天下府州县教官支俸不一，教授俸米五石、学正二石五斗、教谕、训导米二石，有全支本色者，又有减半者，惟云南俱支六斗，北直隶全折钞，请定为例”。上曰：“云南、北直隶其支米一石，余俱令全支”。

英宗正统二年（公元1437年）

朝廷诏令：一、云南乡试取士不拘数额；二、增加云南儒学师生廩米。

又，正统七年（公元1442年），朝廷规定对全国生员三年进行一次甄别考选，有年老、残疾及相貌鄙猥的都取消生员待遇，年上40岁又不谙文理的也废黜为民。但云南、贵州的生员可以免考。

这些措施客观上有助于云南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正统二年三月，增云南所属儒学师生廩米。先是，以云南边诸不足，师生月给米各三斗。至是，以曲靖军民府知府晏毅建言，遂增至六斗。

正统二年十二月，巡按直隶监察御史杨春言：“……天下学校皆设提学风宪，唯云南独以远地未设。乞照例设官”。事下行在礼部，复奏：“……云南学校甚少，分巡宪臣可以兼理，不必设官”。从之。

英宗正统九年（公元1444年）

元代曾在保山地区建永昌府学，后毁于兵乱。明洪武二十七年（公元1394年），秀才余子僖受命往金齿教授，始立孔子庙于中正坊之西，军民子弟皆来学。余子僖卒，其子余谷子承父业，仍执教于金齿。不久，诏令凡军卫皆立学，余谷被推荐担任金齿府学训导。

又，英宗天顺元年（公元1457年），又有进士徐有贞（直隶吴县人）谪戍金齿，先后达三年余，在金齿传播文化，尤其是天官、地理、兵法、河渠、阴阳、方术方面的知识，“士民无贵贱，咸知敬慕”。徐有贞著作有《史断》、《乐府通》、《奏疏》、《杂文》等。

上述三人对保山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有益的贡献，影响较深。

正统六年十二月，命云南等府原系裁减衙门者今省其儒学训导一员。

正统九年正月，云南晋宁州儒学奏：“学宫僻陋，请徙于废僧院”。从之。

正统十三年三月，升云南广南府知府姜浚为云南按察司副使，提督学校及清理军政。

代宗景泰元年（公元1450年）

诏令罢提学风宪官，由各司、府、州、县官提督考察。至英宗天顺六年（公元1426年）复设。

景泰元年七月，吏部言：“云南大理府蒙化州等三十四儒学，俱系边远选贡学校，今后彼处教官考满，乞不拘举人有无，考其通经者升用，不通经者别用，如武举例”。从之。

代宗景泰六年（公元1455年）

云南右布政使陈文编撰《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十卷。这是明代云南编修的第一部地方通志，也是云南现存有关云南教育史实的官书记录。

代宗景泰年间（公元1450~1458年）

据《云南图经志书》记载，彝族接受汉族儒家教育的人逐渐增多。楚雄府彝族“更慕诗书，多遣子入学，今亦有中科第者。”阿迷州彝族“其秀民知学，其州民间之俊秀者，亦入学从师，受经取科贡，而风化其渐美矣”。临安府彝族“俗尚诗书，郡治之近，山水明秀，所生人物，俊伟者多。家有诗书，吾伊之声相闻，而科贡后先不乏。”

姚安军民府彝族“今士类之盛，科不受人。”蒙化府彝族“盖自开设学校以来，闻礼义之教，且近于大理，其亦有所渐染者欤。”清代的志书，也有不少彝族接受儒家教育的记录。如康熙年间的《云南通志》载有：武定府彝族“建学之后，旧习渐迁（旧志）”，（雍正）《云南通志》载有：寻甸彝族“且知读书”，（雍正重修）《富民县志》载有该县彝族“清丽之材，耕织稍暇，即事诗书，列庠序登科名者，蒸蒸然蔚起，鹏程万里，行将相望”。（康熙）《大理府志》载有该地彝族“近皆向学知礼，法争延师，以教其子弟”。其他地方的志书也有类似记载。除受儒家文化教育外，彝族也有自己的文字（彝字）和独特的教育形式。

又，白族接受汉族儒家教育的人也逐渐增多，“皆尚谄书，习礼节，渐与中州阖壤，民德归厚”。大理府白族“民多士类，郡中之民，少工商而多士类，悦习经史，隆重师友。开科之年，举子恒胜他乡，其登黄甲跻华要者，今相属焉。书有晋意，民之俊秀者，颇能出所有晋人笔意。”清代以后，一些地方志书对白族教育的记载也不少。如黄元治《大理府志》载有：“游子礼教之域，以故文人科第。鹄起鸾骞，理学名儒项背相望，此岂独出于中国名家大姓之裔哉……长养栽培，学校之教成，佯达之习化，予以徽一道同风之治也。”艾自修（重修）《邓川州志》载有：“中所一区，七学生员居焉，每遇元旦，集衣冠在会真寺内，朝贺庆祝，午即灯饭宴会，印课文，讲乡约。又耆英数人，每朔望诗酒相谭，做洛社，事曰九老会”。白族没有自己的文字，但曾有过以汉字记录白语的情况。

另外，纳西族接受汉族儒家文化教育的人不少。鹤庆府军民“乐育教化，渐被华风”。清代以后，（雍正）《云南通志》载有“设流于后，礼教渐兴”。余庆远《纳西见闻记·夷人》载有“今读书入泮者甚多，彬彬尔雅，与齐民无别矣。……自设流官以来，俱报恭顺畏法，读书识字者多有之，补弟子员者四人，中式武举者一人。”纳西族历史上曾有过自己的文字，称“东巴文”，也有一套教育方式。

成化三年十一月，贵州布政使等官萧俨等奏：“云贵二布政司儒学，共五十余所，而科额共三十名，而贵州止得十名，宜量增名数，以励风士。”礼部复奏，准乡试举人量增十名，贵州六名，云南四名。成化十年夏四月，增云南乡试举人五名。先是总兵官黔国公沐琮等奏：“云南贵州虽在边鄙，久沾圣化，人才渐盛，往往与中州之士联中甲科、故事，乡试止取四十名，云南二十四名，贵州十六名。人才淹滞，教官亦难转迁，乞量增额数”。故有是命。

宪宗成化六年（公元1470年）

皇帝下令云南提学官专门管理云南学校，原来负责管理的贵州学校令贵州分巡兼理之。

宪宗成化八年（公元1472年）

定边县知县冯源广建立该县社学（即初级小学），之后，各县纷纷仿效，建立社学。

宪宗成化二十三年（公元1487年）

春二月，因云南乡试时录取的文章多有徇私，文理多有不通，礼部奏明朝廷，请求追回考官黄金等人的聘礼，并令巡按御史究问。